

《思想的力量》序

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雅诺什·科尔奈莫属了。就在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大灾难中脱身出来,已经认识到必须改革,却对改革什么和如何改革还茫无头绪,只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去探路的时候,科尔奈在1980年出版了奠定他经济学学术地位的力作《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对集中计划经济及其变体“市场社会主义”^[1]所做的深刻分析,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震动。1986年《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一问世,就在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掀起了“科尔奈热”。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短缺经济”、“扩张冲动”、“父爱主义”、“投资饥渴”、“软预算约束”等概念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本书也成为在中国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主要的参考文献。

继《短缺经济学》中文版在1986年正式出版以后,他的其他重要著作的中文版也陆续出版。^[2]此外,中国读者还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3]科尔奈本人在应邀参加“巴山轮会议”以后,还多次访问中国。在1999年、2005年访问中,他不仅介绍了改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还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科尔奈的所有这些著作和言论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但是,还有一件事堪称美中不足。这就是在我看来科尔奈著作中最重要的,即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思想的力量》中文版还没有能够与内地的广大读

者见面。

这是我最熟悉的科尔奈著作是《短缺经济学》。如同我们知道的,科尔奈一生,由于不完全满意,原因是囿于当时匈牙利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只好进行“自

我审查”，避开那些涉及苏东关系的苏联基本制度的若干“敏感问题”。

苏东剧变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新的形势下，科尔奈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透彻分析，弥补了《短缺经济学》的不足。

然而，《社会主义体制》虽然向读者全面呈现了科尔奈分析社会主义体制时取得的学术成果，但是它并未回答这样卓越的学术成果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尔奈付出艰辛的努力，不畏艰险地攀登学术的高峰？所以，这本被科尔奈称为“另类自传”的书，不但讲述了他何时发表哪些著述和言论，而且从主观的角度“解释在某时我为何有某种想法，哪些因素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以及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这种求索后面的推动力量，则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真知的追求。或如科尔奈在这本自传中所说：“我这一生中，从来不曾为名利奔波，穷尽一生努力追求的，唯有深刻的思想。”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为《思想的力量》繁体字版写的推荐语指出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家应当怎样为真理、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我和科尔奈教授相识相知始于1981年。那年夏天，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EA)在雅典举行“相对价格的圆桌会议”，我被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席于光远教授派去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科尔奈和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经济学会主席哈恰图罗夫(V. R. Khatchurov)院士在短缺的制度根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哈恰图罗夫认为，从长期来看，计划体制下并不存在系统性的短缺。而我认同科尔奈的观点，并以中国为例，说明了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系统性的短缺。会后我们促膝长谈，结成了延续三十多年的友谊。我在与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我想和他接触的人都会与我有共同的感受。通过《思想的力量》的出版发行，更广大的读者，不论是同意科尔奈观点的人还是不同意的人，有望和我们一样，能够分享科尔奈的思想成果。它将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一大幸事。

吴敬琏

2013年2月7日于北京

注释

[1] “市场社会主义”是源于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的一种社会思潮，按照它的一位倡导者W. 布鲁斯解释，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理想模式，即生产资料属于国家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则。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用“有调节的市场”取代行政指令来配置稀缺资源。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市场社会主义”具有广泛影响。

[2] 《短缺经济学》(1980)，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增长、短缺与效率》(1982)，崔之元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科尔奈经济改革理论》，何家成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反均衡论》(1971)，刘吉瑞、邱树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转型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2001，和翁笙和合著)，裘宗燕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992)，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如《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之间的亲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经验》，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6期；《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年之后：作者的自我评价》，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5期；《解读软预算约束》(与Eric Maskin, Gerard Roland合著)，载《比较》2002年第4辑；《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视角》，载《比较》2003年第9辑；《大转型》，载《比较》2005年第17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于短缺和过剩的市场理论研究》，载《比较》2011年第57辑；《创新与活力：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载《领导者》杂志总第35-36期，2010年9-10月，等等。